

郑观应国防思想略论

李彦宏 李柏云

郑观应(1842—1992)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生活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经济逐步解体并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的时期。其以振兴工商,自强御侮为志,在长期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其中,国防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形成于19世纪60到90年代,主要包括建立近代化的国防军、海防边防并举、寓兵于民和兵战商战相结合等几个方这一思想贯穿着自强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向西方学习为指导方针,具有明显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特征,并且体现着一种“攘外”重于“安内”的新的国防价值观。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一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入侵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郑观应的国防思想由萌发走向成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门被进一步打开,清政府的腐朽也进一步暴露出来。这时,郑观应开始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澳门为据点拐骗华人到美洲充当奴隶的罪恶。他看到那些亲人被拐卖出洋的人家“父失其子,妻失其夫,长离桑梓,永溺风波。有死别之悲,无生还之望。”这种罪恶行径“无异于设陷阱之境中也。”“溯自设立招工馆以来,为其所陷害者不可胜数。中国之人,无不发指涕零者。”^①这一时期,郑观应还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横行霸道,侵犯我利权的情形,指出洋人“既入我国营生,当以我中国规矩。”“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岂以我华人孱弱,不妨任意残暴乎?抑恃国强大,天下无出其右,即纵性横行,亦无奈何者乎?”^②并愤慨地指出:我国以一个“地有十八省之广,人有不知几千万亿,富足以补美、英、布、法四国府库之虚”的大国,“目下不过为势所鱼耶?”^③这里,郑观应不仅表现出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

他的国防思想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7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患更加严重。“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定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年未之有也。”^④在西北,沙俄侵占伊犁,在东南,日本占领了台湾,“滨海之省,广东则香港一岛已属英吉利,澳门一岛亦属葡萄牙。其余南北各口,综计三埠,彼此通商,而洋人之心犹以为未足也。”^⑤同时,中国西南邻国也日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占。这些国侵占了中国之邻国后,就会“藉此窥伺中原,积久生变,遂手以长驱直入”威胁中国的安全。

这种局势给郑观应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关心可以安内攘外的自强御侮之计,他认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⑥在这里,郑观应提出了改变当时腐朽落后的习俗、了解外国的情况、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的主张,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由此,郑观应向西方学习以自强御侮的国防思想开始萌发。

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弊端暴露无遗,而且这一时期的民族也日趋严重。郑观应洞察时局:“今中国为日本所侮,更为泰西各国所皆知我兵将之弱,军器之窳,国库之空,汉奸之众,吏治之坏,民心之涣。”^⑦中国屏藩尽撤,俄瞰于北,英瞰于西,法瞰于南,日耽于东,且英、法、美、德、俄、日先后向中国皆索有租界,为侵占之先机。”^⑧在如此紧要的危机关头,他潜心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增订新编了《盛世危言》,他在书中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振工商;俗振工商,必先讲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⑨在此他认为中国亟须振工商以致富,致富以自强,而这一切的目的无不是为了“攘外”。这就把自强御侮、保卫国家安全看成是当时中国迫切的首要任务,把振兴工商业看作是自强的根本措施,把兴学校立宪法、改良政治等看作是自强的根本保证,把兴学校立宪法、改良政治等看作是自强的根本保证。这种在政治上立宪法、在经济上振工商、在文化上尊

重道德讲求学校来增强国家的实力以达到自强御侮之目的思想,就使得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更为丰富、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这表明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已经由七、八十年代“师夷长技,知己知彼”的层次跃进了全面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以自强御侮的高度,是这一思想发育到成熟形态的表现。

二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其一,建立近代化的国防军队。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清政府的军队都屡战屡败,不堪一击。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更是从海上到陆上全线溃败。郑观应考察其原因,发现清军“人各一心,营各一名,政出多门,不相统属。”^⑩并且在战时“自幸偷安旦夕”,坐视支军败迹而无动于衷,或者“逍遥局外,调遣不前。”在军队内部,“兵之于将,将之于帅,上下离心,俨同冰炭。”^⑪军队的经费和将官薪水不足,克扣军饷的事随之出现,官兵离心离德,士兵不肯效命沙场甚至临阵叛逃。显然,依靠这样的军队保卫国家安全是不可能的。社会现实要求尽快改变现状,全面变革,建立起一支能够担当起抵御外侵略保卫国家安全重任的近代化的国防军队。

郑观应认为,要建立这样的军队,首先必须军令统清政府虽设有海军衙门,但海军提督归疆臣节制,海军在实战中处处受疆臣指挥,不能随机应变,以致贻误战机,故“昔有马江之败,今有威海、旅顺之失”^⑫必须尽快设立不受疆臣指挥的巡海经略,总统南、北、中三洋海军。当此大任者,还必须是“先赴外国水师学堂观政三五年,学习有成”的王公、贝子、贝勒中的“有志军旅者”。^⑬其次,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郑观应认为,日常训练军队战斗力的保证,“整旅行师尊重于练。”^⑭还要注意重实战演习,因为西方国家的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常演习中“设假敌与正军队列,互相攻击,出奇设伏,一如交战状,俾习惯于平时。”^⑮他主张三洋海军舰队每年交换防区进行演习训练,以相互熟悉各防区的“沙线、礁石、水潮深浅”等情况,并且由近及远,逐步走向五大洲的各岛各埠,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⑯陆军也须如此,一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操练,去劣取优。“每省练兵若干,其不入选者汰之就地另募精壮补充。”^⑰这样才能保证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再次,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队指挥人才。郑观应看到将帅对军队继而对国家

起着关键作用:“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⑱西方各国军队的将帅都是军事学校毕业后又“久历战阵资格极深者”,清军将帅则平日不习武艺,不读兵书,沉湎于酒色,战时又贪财惜命,根本无力指挥军队。所以各省应效法西方“仿设武备学堂。其将帅、营、哨各官务选明练之才,讲究韬略,参用西法,实事求是。”^⑲熟识中外兵法、量算、天文、地理、图说与古今战阵胜负根源者,乃能鞠旅阵师,为三军之司命。”^⑳“水师每镇亦须设立学堂,一切舟楫、橦帆、测风、防颶、量星、探石,枪炮命中诸大端,必须确有见地,事事精能,庶他日强邻压境,指挥操纵悉合机宜,不致徒靡巨饷。”^㉑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俾能适应建立近代化国防军的需要。

其二,海防、边防并重。自古以来,中国的外患都来自陆上北方的少数民族,而鸦片战争之后,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㉒清政府面临的是来自陆地和海洋上四面八方的强敌,国防形势空前严峻。

针对这种局势,郑观应提出了海防和边防并重的主张。在海防方面,建立舰队与岸炮相结合的沿海防线,实施近海防御战略。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为北、中、南三洋,按地势险易程度分别轻重,实行重点防御。北洋北起东三省,至山东的烟台,以旅顺、威海为重点;中洋自自海州到马江,以崇明、舟山为重点;南洋自厦门到琼州,以台湾、琼州为重点。以炮船水雷扼守海口、内港,三洋舰队首尾相应,“凡海口生重地,莫不森列炮台,严为防范。……筑台必照西式之坚,制炮必如西法之精,守台必求其人,演炮必求其准,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表里相资,奇正互用。”^㉓如此引战舰与炮台战守配合,互为表里,方能收到御敌之效。在边防方面,东起库页岛,南到台湾、琼州,西至噶会喀尔,北到外兴安岭,列强环伺,随时都可进攻。郑观应判断,敌人无论是分兵侵犯还是合力进攻,必从陆上而非从海上开始,中国之国防,当以边防为要,而边防的重点是防俄。中俄之间有绵长的边界线,俄国早就在库页岛屯集重兵,并不惜巨资在不毛之地的西伯利亚修筑铁路,这显然是为侵华作准备,矛头直指中国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㉔在西南边陲,边防局势也日益严重。缅甸、越南已成为英法吞并,印度早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滇藏已成为英法进攻的直接目标,这一地区的防务应以防英法为主。具体措施应该是“添练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

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①

其三,寓兵于民,实行群众战争路线。郑观应认为,在国势衰微,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发动群众,人自为战是先之有效的策略。实行群众战争路线,首先必须实行全民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树立群众的国防观念。“宜使各省慎选知兵任事之员,设立武备院,参照西法教习。沿海州县及边疆各人民,先择里长,设局训练,教以刀、矛、枪、炮等技。一俟学成,则教其所管十人,十人学成,则各教其家人,使人尽知兵,同心敌忾。……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气相应,休戚相关,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运调之苦。”^②再者,实行移民开垦以充实是边疆的屯田政策。郑观应说这是“切实之要策”。方法是边疆督抚派员探测荒地,之后招募内地闲民举家前往,政策之重点应放在边防最为空虚的西北地区。“以民养兵,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而民可无忧。兵民相依,人自为战,而边防安有不固才哉!”^③

其四,兵战与商战相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军事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原料和拓展商品的销售市场。“西人以商为战,土、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家拓土开疆也。”^④这种商战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柘腊。……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⑤因而,商占比兵战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蔽性。为了在与西方国家的商战中取胜,郑观应提出“我国人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⑥用兵战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如此兵战与商战相结合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自强御侮,消除外患的问题。

郑观应认为,国富是兵强的前提,兵强是国富的保障,二者互为表里,建设近代化的国防,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是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切无不要耗费巨资,“府库未充,财赋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⑦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这就需尽快发展经济,为国防近提供足够的资金条件,而讲求商务、在与外国商战中取胜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欲制西人以自强,莫若振兴商务。”^⑧

为“振兴商务”,郑观应提出了以商业库心全面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国家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以保护贸易顺差,革除弊端为商业发展扫清道路,建立机器制造业以提高生产效率,讲究商贾之学以增减实用人才,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会不断增强商战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为国防近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

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郑观应应为国防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其自强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郑观应终生辗转于外国在华企业、洋务企业和商办企业中,始终以救世为己任,致力于救国道路的探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他的国防思想无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逐步有所提高,因此,可以说这一思想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总的看来,自强御侮既是郑观应国防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大大突破了古典爱国主义精神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近代特征。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二是其以向西方学习为指导方针。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以来,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共同走过的道路,郑观应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国防思想中,无论是建军思想、海防思想、边防思想,还是商战思想,无一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将其利弊得失放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他摒弃了落后的华夷观念,明确提出了“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⑨的主张,这种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也正是郑观应国防思想的进步性之所在。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三是其蕴含的民本思想。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和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现实,决定了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一定处于劣势地位,况且,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敌人已不再是“未知王化者”的落后的“蛮夷”,即境内少数民族和北部游牧部落,而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为依托、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老牌的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防御型、持久性的群众战争,这也为后来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所证实。郑观应认识到反侵略战争的最伟大的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主张文泛教育、发动和训练群众,兵民相依,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防民甚于防寇”的指导思想,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四是其崭新的国防价值观。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国防价值观都以维护其专制统治为基本内涵,统治者把“攘外必先安内”奉为圭臬。近代国防价值观则更注重国防力量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针对广泛发动和训练群众恐会引起民变的忧虑,郑观应指出,“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可不因时制宜,亟为应变之举乎?”^②这种国防力量“攘外”重于“安内”的主张,体现了新的近代国防价值观。尤其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萌发的背景下,郑观应的这种认识已超出了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的水平,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在民族国家主权领土观念尚未出现的古代中国,在最高统治者如何统治“王土”、“王臣”问题上,“以道德化育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这种观念以其巨大的惯性延续到近代。对于如何驾驭“四夷”,倭仁主张“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③。甲午战争时期也有人声称:“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狡诈,我以忠信,是中国之势足以与日本相敌,日本之德不足与中国相抗也。”^④郑观应的国防思想虽然与上述思想相比有着明显的先进性,但他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浸淫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他说:“惟愿我师彼法,必须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调识阴阳造化之几。……无分畛域,永息兵戈。”^⑤这明显地表现在如何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上郑观应仍主张“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且中学西学相互调和以消除文化冲突、寄和平的希望于道德教化的思想。70年代前后,他认为:“美国秉信守礼、风俗醇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力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⑥80年代后了也称:“前此法人扰我闽防,特因失利于刘军,欲取偿于中国,……非果有谋我之心也。”^⑦直至甲午战争后,他竟然仍谈到:“所幸东邻(指日本——引者注)本系同文、同种,近来力图富强,国有人焉。甲午役竣,彼亦深悔自伤同气,……故年来弃瑕释嫌,出肺肝以与华人相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欲为异图

缓急之图。”^⑧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性的模糊认识,是郑观应国防思想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认识表现在他的外交策略上,就是主张或中英联盟以拒俄日,或联俄制英,或联日制俄。在这里,他只看到西方国家矛盾的一面而未看到西方国家在侵华问题上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在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上,他找不到传统文化外界更有效的方,而只能把列强纷争的世界局势简单地比附为战国时代的诸雄争霸,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切合实际的约纵连横的外交策略,这是他国防思想的一大缺陷。

郑观应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蹒跚起步。作曾这一新生阶级的代表,郑观应的思想体系中进步的成分和传统的局限并存,其国防思想亦然。“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⑨郑观应国防思想的局限性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的表现。尽管如此,这一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仍是主要的。其对于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⑳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夏东之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3、33、125、114、173、932、801、869、869、755、758、853、870、874、857、842、857、785、128、775、775、899、776、596、586、598、597、614、597、903、244、114、774、826页。

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页。

⑩《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25页。

⑪《中日战争》(一),第134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

[作者 李彦宏,湘潭师院历史系副教授;李伯元,华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汪高鑫)